

世纪曙光文丛

裴世俊 著

王士禛

传论



中国文联出版社

王士禛传论

裴世俊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士禛传论/裴世俊 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 1
(世纪曙光文丛)

ISBN 7-104-01333-4

I. 王… II. 裴… III. 理论研究—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2329 号

世纪曙光文丛·王士禛传论

裴世俊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山东和平印刷厂 印刷

25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5 印张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104-01333-4/I. 543 全十册定价:300.00 元

本册定价:18.00 元

本书得到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资助

引 言

清初“诗学之盛，莫盛于山左”，“山左之诗甲于天下”（《山左诗抄序》），除了山东诗坛上出现一批著名诗人外，最主要的代表是诗坛领袖王士禛，“国朝称诗坛，渔洋起山左；主盟四十年，有似中流柁”（宋湘《红杏山房诗抄》），处在执掌牛耳的地位，具有“一代正宗”的价值，“海内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无远近贵贱，识公之面，闻公之名，莫不尊之为泰山北斗”，著籍称门下弟子者，亦“不下数千人”（王揆《神道碑铭》）。其诗论与创作的影响，转移了诗坛风气，产生天下翕然追慕之效，出现“绝代消魂王阮亭”（《随园诗话》卷3）的赞誉。

王士禛出身名门望族，祖上为明朝的官员，清华世家，一门人文，优裕华贵的环境和书香门第之家，让他自幼得到良好的教育，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明清易代后，在新朝的科举考试中，连取郡、邑、提学三试第一，会试中式，授任扬州推官，五年后调升京职，深得康熙皇帝赏识，不仅以其诗“中和敦厚，可覩世运”，被尊为诗坛圭臬，还因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寻迁侍读，入值南书房，得到了汉臣由部曹改词臣自其始的破格提拔，直至荣升刑部尚书，位跻六部九卿之列，达到其仕途的顶点。其官声清明，人品高洁，亦可谓一代廉吏。死后在乾隆朝又蒙“圣喻”，称其“积学工诗，在本朝诸人中，流派较正。从前未邀易名之典，宜示褒荣，以为稽古者劝”，获得追谥“文简”的殊荣。

士禛一生嗜书、读书，笔耕不辍，著述宏富，生前辑其诗、文为《带经堂集》，凡92卷，清刊《王渔洋遗书》收录其诗文、

笔记、诗话、杂著等共 24 种 189 卷。他的散文，丰富多彩，在清初堪称大家，序、跋、传、碑文、游记、随笔、日记，抒情述志，简洁明畅，富有情致。所撰杂俎，除记时事、制度、掌故和读书札记外，还有笔记体的小说，颇有特色。在清代笔记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尤以诗著称于世，晚年自订《带经堂集》收诗近 4 千首，数量不少，即使与门人仿宋代任渊编纂黄庭坚诗之例，成《渔洋山人精华录》，选择其一生诗歌创作的精华，也有 1697 首。还有《衍波词》及词论《花草蒙拾》，合编词选《倚声初集》。以及编选《唐贤三昧集》等十余种。如此突出成就，又是利用“公余之暇”，没有勤于著述的毅力是难以取得的。

士禛以善诗称，其他方面成绩（包括为官政绩）几乎为其掩盖。其诗兼总众长，不名一家，但最能反映其创作特点，占有显著地位，而又好评如潮的，是独具一格的神韵诗，这类诗大约有二、三百首。24 岁于山东济南大明湖赋《秋柳四首》是其成名作，曾轰动一时，大江两岸和者有数百家。扬州五载所写《秦淮杂诗》、《冶春绝句》，再次名噪南北，被“争写”“齐唱”，东南诗坛将其“推为祭酒”，由此走向全国，踏上领袖之路。郑方坤评论他的神韵诗“尤浸淫于陶孟王韦诸家，独得其象外之旨，弦外之音，不雕饰面工，不锤炼而练，气超乎鸿蒙之先，而味在酸咸之外”（《国朝名家诗抄小传》），赵翼则评为“千古绝调”（《瓯北诗话》卷 10）。他以此号召天下，标举“神韵论”，其“神韵”说诗风靡前清诗苑，定为文坛之“一尊”，是扶轮大雅、宏将风流的盟主，其声望足以奔走天下，“迄然为一代大宗”。

士禛取得成功，有性格、才情和气质方面的原因，也有诗歌本身发展在因循适变上的要求，以及历史和时代的选择等因素，

可说是内外因合力的结果，并形成—个显著的座标，关系到—代诗歌演进走向和转折的问题。

士禎幼承家訓，早慧聰穎，其兄授以“王、裴詩法”，培養儒雅的性格，形成“才本清雅”的藝術個性，又崇奉唐司空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和宋代嚴羽的“妙悟”、“興趣”，以禪喻詩，把它視為詩家三昧，主張以簡練的筆觸、含蓄的意境、平淡清遠的風格，創造“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深意和美感，觸及到了詩的言外之美的特性。以含蓄深婉為美，這是我國古代詩歌的民族特色和藝術傳統，表現出與西方不同的藝術追求和審美情趣。清代詩論家葉燮曾把它概括為“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託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引入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為至也。”（《原詩·內篇下》）可見，他把形象性原則，以獲取言外之旨來追求詩歌的藝術表現之美，作為產生魅力和動人的所在，已探驪珠，深得詩之本旨和藝術創造的真諦，是使詩回歸美學領域、突出審美特征的又一次努力，他所作的獨特貢獻，是符合創作規律和藝術獨立的价值。

同時，論詩力主神韻，也超出分唐界宋的門戶之爭，並用其糾正明代七子的模擬剽竊的流弊：重貌和形式而遺神之失，以及學宋詩帶來“清利流為空疏，新靈浸以佶屈”偏向；反復古派以強調個性之真而忽略詩美之韻，達到以作者之“神”（個性）和詩體之韻（詩的美學特質）有機結合，為寫作清新可誦的詩篇開辟新徑。可見，它是詩歌內部發展和嬗變的產物，有其出現的必然性。

而且，它於清初社會心理變化合拍，應和鼎革之際士人哀傷失落的清緒和傷逝懷旧的心態，又在統治者日趨嚴密的進行思想控制時候，為操觚之士營造一個逃避文字獄的避風港，適

宜压抑状态下内敛拘谨的抒情需要。并与清初由战乱向稳定过渡的时期相适应，成为“盛世元音”，用来润饰昭代的鸿文藻业，以“觐世运”，装点升平气象，故其神韵说和神韵诗，也是清廷需要和接受的一种诗学理想，就此而言，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是历史、时代和个人选择的合一，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清诗在王士禛导引下走向正宗，确立为“一代宗主”的地位，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才能在“巨人接踵”情况下脱颖“代兴”，成了众望所归的领袖，是有着顺乎时势和历史要求的特点。从这个角度，亦即不把它归结为仅是个人的原因和行为，对揭开神韵论及其创作的实质，给予合理的阐释，应当说是一个关键。

了解这些，深感过去对神韵说及其创作受到冷遇，评价不高，甚至过分苛责，有失公允。自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以来，文学事业繁荣，蒸蒸日上，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摆脱了偏狭的批评观念，情况逐渐好转。王士禛的家乡，为了宏扬乡邦先贤，建立“王渔洋纪念馆”，搜集整理其著作文献，召开了全国规模的学术讨论会，编辑出版《王渔洋研究论集》两种、《渔洋精华录》新的集注本，和作为“明清笔记丛书”的几种笔记，也产生一批有研究水平的新成果，从而标志着王士禛研究的规模 and 水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介绍其成就、业绩的传记，这与其地位、名声很不相符，作为一名在鲁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有这个责任去弥补齐鲁文化领域的缺憾和空白，因此，本人不揣浅露，撰写了《王士禛传论》，以期对他的总体面貌、文学活动及其演变轨迹、成就地位等，进行较为全面的综合反映，为推动清诗、王士禛以及齐鲁文化的研究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目 录

引 言	(1)
-----	-----

上编 王士禛传

第一章 家庭教育和文学环境	(3)
第一节 官宦世家的门第	(3)
第二节 自幼能诗的才华	(9)
第三节 身际易代的童年	(15)
第二章 宦途通达和仕历政绩	(22)
第一节 忧喜交汇的科考	(22)
第二节 扬州任上的治绩	(29)

第三节	内迁入京的“荣耀”	(38)
第四节	文学侍从的“异数”	(45)
第五节	顺利升迁的官次	(53)
第三章	风神卓绝与主持风雅	(62)
第一节	文学活动的发轫	(63)
第二节	《秋柳》咏唱的轰动	(71)
第三节	五载扬州的风采	(79)
第四节	一代宗主的产生	(88)
第四章	诗学衍变与垂暮之光	(96)
第一节	入蜀使粤的诗变	(96)
第二节	复返唐音的“三昧”	(104)
第三节	罢官里居的暮年	(114)

下编 王士禛论

第五章 “神韵”内涵与审美特征	(125)
第一节 “神韵”的来源追溯	(125)
第二节 “神韵说”形成过程	(133)
第三节 “神韵说”审美内涵	(143)
第四节 “神韵诗”创作成就	(152)
第五节 “神韵说”主盟诗坛	(161)
第六章 《衍波词》集与词坛“总持”	(171)
第一节 士禛的词学理论	(172)
第二节 士禛的倚声之作	(179)
第三节 士禛的词史地位	(189)
第七章 散文大家与说部宗匠	(198)
第一节 士禛的散文小品	(199)

第二节	士禛的笔记小说	(208)
第三节	小说理论与艺术	(217)
第八章	神韵领袖与海内闻人	(227)
第一节	士禛与钱谦益	(227)
第二节	士禛与蒲松龄	(241)
第三节	士禛与孔尚任	(251)
第四节	士禛与赵执信	(263)
第九章	身后是非与评论撮要	(276)
第一节	性灵主帅袁枚之品评	(277)
第二节	桐城后学姚莹之品评	(285)
第三节	《谈艺录》及现代之品评	(295)
主要参考书目		(306)
后记		(309)

上 编

王士禛传

第一章 家庭教育和文学环境

第一节 官宦世家的门第

王士禛原籍诸城，属山东青州府，他自谓：“世居青州之诸城，古琅琊地也”，祖上迁至济南新城，遂著籍焉。据康熙年间所修《新城县志》卷一“琅琊王公遗址”条载：

公讳贵，王氏始祖也。元末白马军乱，自诸城迁于邑之曹村，遂家焉。三世至封翁颖川公，食指渐多，子孙渐显。故宅尚存，后人世守之”

以此看，王士禛是祖上自诸城迁往新城的，时间也并不长，到他本人也不过八世，即一世之王贵（即琅琊公），二世之王伍（即善人公），三世之王麟（即颖川公），四世之重光（即忠勤公），五世之之垣（即司徒公），六世之象晋（即方伯公），七世之与

敕（王士禛之父），八世至王士禛兄弟辈。

祖上的迁徙，据《诸城王氏族谱》说王贵因误伤人逃往新城，而士禛于自撰年谱则说：“当元末白马军乱，公（按，王贵）狙击之。杀一贼，度不能抗，乃避居新城之曹村，为某大姓佣作。”更神奇的是王贵的夫人，在其《池北偶谈》卷十“初夫人刘夫人”条记载：“先始祖妣初夫人，诸城人，年始笄，一日，忽为大风吹至新城之曹村。时始祖琅琊公，方为某大姓佣作，未婚，遂作合焉。”这类传言，自然不可信，但他说明王氏始祖及始祖妣是诸城人则毫无疑问的。虽然其祖上迁居新城，但后代人一直不曾忘怀故里，他们称呼始祖王贵为琅琊公，而且王士禛与其兄士禄合刊诗集称《琅琊二王合刻》，后来祖父王象晋还在厅堂写一对联云：“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其意也是要子孙不忘始祖琅琊公为人“佣作”、创业的艰难，继承“克勤克俭”的家风，代代相传。

新城今已为镇，属淄博市下辖的桓台县，因境内有齐桓公戏马台而命名，周属齐国，秦归齐郡，在金末之初为新城，元明因之，清代属济南府，仍名新城县，原治所在今桓台县的新城镇。1914年又改现名桓台，沿用至今。淄博在历史上属古文化昌盛的齐鲁之邦，临淄曾作为齐都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而在其北的桓台，也在此时号称“冠带衣履天下”，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历代文人名士辈出，是“文物之帮，诗书世泽”之地。淄博地势南高北低，南山北水，桓台则处在北部鲁中的平原地区，县境内有锦秋、马踏二湖，尤其马踏湖号称“齐鲁独秀”，沿湖河汉纵横，水道曲曲弯弯，家家靠湖，村村依水，荷花盛开之际，苇蒲青青，身在北国平原，却极似游于江南水乡之地。

在新城镇内的新立村，有一组典型的明代建筑，是为纪念

王士禛的高祖王重光所建。王氏后裔将其视为家祠，该祠建立于明万历己丑（1589），距今四百余年。明末清初祠盛时，占地约30多亩，有厅台、碑廊、制门、碑亭等，制门青石柱上方，刻有“诸侯戴露朝天”圆雕，中间的石额是“登辛丑科进士王重光”，边联是“万里勤王忠侔日月昭青史，一身殉国气作山河壮紫宸”。广场边均为青砖砌就，条石压顶。制门至大门有笔直甬道，甬道旁建有两座碑亭，大门额上悬有“忠勤祠”横匾，进大门后陈列一巨石匾额，镌有礼部尚书吴山正楷书写的“忠勤保国”四个大字。“忠勤祠”是王氏家族家世辉耀的见证和标志，记载着自明朝以来，尤其是隆庆、万历年间“科第之盛，甲于海内”的盛况。其高、曾、祖，父辈考中进士做官的有26人，同辈兄弟间有6人，其中二品官阶者4人，五品官阶以上者14人。明末清初180年间，海内视其家为望族，不但科甲相联，而且簪缨不绝，号为“江北青箱”。里中至今还立有“四世官保”的牌楼，王士禛也自称：“二百年来科甲蝉联不绝”（见《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

其中仕宦与著名的有下列几人：

高祖父王重光，字廷宣，王鳞次子，明嘉靖辛丑进士，以户部员外郎榷税九江，历官户、工二部主事，后调职贵州参藩，以疾病故，赠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

曾祖父王之垣，字尔式，号见峰，重光次子，嘉靖壬戌进士，起家司理，官至户部左侍郎，居家卒后以子象乾贵累赠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户部尚书。著有《历仕录》等书，记其生平仕宦行事及师友交谊，善诗文。

叔祖王之都，字尔章，号曙峰，王耿光之子，万历乙未进士，官至开封府知府。

叔曾祖父王之城，字尔守，号会峰，重光第六子，以恩贡